

1989年匈牙利圆桌谈判研究*

邵浴日

【内容提要】 本文以解密档案为基础，对匈牙利政治剧变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将其分为谈判前奏、筹备会议谈判、圆桌谈判、全民公投以及议会大选等数个历史阶段。同时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反对派阵营的关键政治策略予以分析，进而就朝野双方针对政治谈判主体应当由几方构成、是否应当将经济议题也纳入谈判议程、总统职位的选举方式与选举时间，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应当公示其资产统计信息等各个重要谈判议题所展开的博弈过程进行了重点的梳理，由此呈现出匈牙利实现此次政治剧变的大致历史过程。

【关键词】 匈牙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 反对派 圆桌会议 政治转型

【作者简介】 邵浴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

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出人意料地发生剧变，绝大多数原先由共产党执政的中东欧国家都相继放弃了苏联模式的一党体制，转而采用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作为东欧集团中第二个开启实质性变革的国家，匈牙利的变革进程在整个剧变过程中起到了某种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而其自身实现剧变的关键环节便在于共产党当局与反对派阵营所开展的圆桌谈判^①。

匈牙利圆桌谈判因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获得了西方学界的重点关注。但是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其关注重点也大多聚焦于匈牙利

* 本文为第二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前沿论坛优秀论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项目编号：12&ZD188）以及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ZDB06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承担。

^① 参见邵浴日：《通过谈判的革命——匈牙利圆桌谈判的历史意义及文献资料评述》，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9/20合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151页。

实现此次政治转型的背景、条件、方式、结果及其效果评价^①。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对圆桌谈判的过程与内容给予了一定的披露，但由于当时的研究资料所限，往往也只能止步于对谈判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或重点议题予以介绍，距离全景式地呈现这一历史进程还有一定差距^②。

如今匈牙利圆桌谈判的相关档案文献都已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出版，主要包括朝野双方各自的内部会议纪要以及双方进行谈判的会议纪要等。本文试图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匈牙利圆桌谈判中朝野双方关键政治策略的制定过程，以及双方针对各个重要谈判议题所展开的博弈过程予以重点梳理，并进而勾画出匈牙利实现此次政治剧变的大致历史过程。

一 矛盾的积累：二战后的共产党统治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隶属于轴心国集团。1945年轴心国战败，匈牙利被苏联红军占领，随即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虽然斯大林当时并未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推行共产党的一党体制，而是采用建立所谓“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但是匈牙利共产党^③（MKP）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支持下，依然在战后首次选举后的政府中取得了数个关键的部长职位^④，其中还包括掌管着整个警察系统的内务部长一职。此后匈共便在其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的领导之下对其政治

① 主要作品有：András Bozóki, András Körösnéyi and George Schöpflin (eds.), *Post - 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1992; Adam B. Seligma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Hungary*,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4; Béla Király and András Bozóki (eds.), *Lawful Revolution in Hungary, 1989 - 1994*, Boul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主要作品有：András Sajó, “The Roundtable Talks in Hungary,” in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69 - 98; László Bruszt and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Ivo Banac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 - 55; Rudolf L. T 8 1 8 0 3 2,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1957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匈牙利共产党的名称在战后曾经历过数次修改，起初叫做“匈牙利共产党”（MKP），后来于1948年6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其后又于1956年10月31日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SZMP）。鉴于该党的组织结构与执政方式在其于1989年10月7日改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MSZP）之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本文为行文方便，除直接引文外，以下统一简称为“匈共。”

④ 在1945年11月举行的战后首次议会选举中，中右翼政党独立小农党（FKGP）赢得了全国57%的选票，而匈共只取得了17%的选票。按照选举结果，独立小农党本应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力，但在苏联当局的压力下，独立小农党不得不接受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将其他几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也纳入政府内阁。Joseph Held, “Hungary: 1945 to the Present,” in Joseph Held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7.

对手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打压，并在1947年8月举行的战后第二次议会选举中成为了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并借此率领左翼政党联盟登上了执政舞台^①。

1948年6月，拉科西强行实施了匈共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合并，合并后的政党叫作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DP）。鉴于整个新党完全是以匈共为主导的，因此这次合并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消亡。匈共同时还取缔了其他所有的反对派政党，并于1948年7月建立起直接对内阁领导人拉科西负责的国家保安局^②（AVH）。在拉科西此后的统治之下，匈牙利国内的政治清洗愈演愈烈^③。在经济领域，拉科西主导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政策。此外在教育、宣传、文学及宗教等各个社会文化领域，拉科西也主导建立了极为严格的管制制度^④。

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之后，拉科西遭到了新一届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匈共党内的温和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得以出任政府总理，开始着手实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然而此后拉科西又借着匈共改革派在莫斯科的支持者马林科夫的失势，于1955年4月14日成功操控匈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纳吉开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重返权力的前台。不过鉴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转变，拉科西未能完全恢复之前的统治方式^⑤。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匈牙利国内要求实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6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街头终于爆发了一场要求当局实行实质性改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该运动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起义——示威群众在其同情者的帮助下与秘密警察以及开入布达佩斯市区的苏军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1月4日，苏联军队大规模开入匈牙利全境，对这场运动实行了全面镇压^⑥。这就

① Joseph Held, "Hungary: 1945 to the Present", pp. 208 - 212.

② 该机构最初叫作“政治警察局”（PRO），后来于1946年被改名为“国家保安处”（AVO），属内务部管辖，此后又于1949年从内务部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并于1950年1月被正式定名为“国家保安局”（AVH）。其职责是对所有可能威胁到匈共统治的人员或组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实施监视、调查、逮捕与刑讯等等。Joseph Held, "Hungary: 1945 to the Present", p. 213.

③ 根据统计，在1948年至1953年这段时期内，匈牙利共有75万人受到了政治审讯，占全国总人口的7.5%，其中有15万人被判刑关进了监狱或集中营。受害者不仅限于匈共的政治对手，同时也涵盖了大量的匈共党员，多名匈共高层领导人也同样未能幸免。Joseph Held, "Hungary: 1945 to the Present", p. 215.

④ 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3页。

⑤ 同上，第58页。

⑥ 1956年事件被镇压之后，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先是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后来在被迫离开大使馆后遭到苏联军队逮捕，接着被押送到罗马尼亚关押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些领导人最终又被押回匈牙利国内，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包括纳吉本人）随后被冠以叛国罪的罪名于1958年6月16日遭到处决。Joseph Held, "Hungary: 1945 to the Present," pp. 220 - 222.

是匈牙利历史上著名的“1956年事件”。

1956年事件之后被苏联当局选中的新一任匈共领导人是卡达尔·亚诺什，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匈共的一党体制，但是其统治风格总体来说比拉科西温和务实许多。到了60年代，卡达尔还着力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匈牙利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东欧阵营中名列前茅。然而卡达尔的经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计划经济的体制根基，政治体制改革也未能得到同步的推进^①。有限的改革终究克服不了体制固有的缺陷，危机只是被延缓了，却并未得到根除。

二 谈判前奏

（一）20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局势

进入80年代之后，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均已显出明显的疲态。匈牙利当然也无法例外，其经济陷入了增长乏力、物价不断上涨以及外债持续增多的困难局面。到了1987年下半年，连匈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都不得不公开承认整个体制陷入了全面危机。事实上，整个国家不仅陷入了物质层面的经济和债务危机，与此相伴的还有精神层面的道德危机。到了80年代末，匈牙利国内已经很少有人会再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真了，即便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党国要人也同样如此^②。

可以说，当时的人们或多或少都能感知到国家正处于某种制度性的危机之中，社会上要求匈共放弃其垄断权力、实现某种形式的政治多元化的诉求也应运而生，匈牙利民间持有民主化理念的反对派组织也呈呼之欲出之势。

面对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改革思潮与运动，匈共领导层也逐渐意识到，需要实行更为实质性的改革。1988年5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免去了卡达尔的匈共总书记职务，由之前担任政府总理的格罗斯·卡罗伊取而代之。大会还对政治局成员进行了调整，更多年轻且更具改革意愿的新生代领导人

^①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卡达尔是否具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当时的国际环境都不允许匈牙利迈出这一步。1968年8月，以苏联军队为主的华沙条约部队对于“布拉格之春”的武力镇压，也为此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印证。

^② 关于匈共当局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及相关影响，可参见 Rudolf L. T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1957 - 1990*, pp. 253 - 304.

得以进入政治局^①。但是总体而言，匈共当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对政治转型的目标形成任何具体或成型的意见。1989年年初，国内和国际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真正迫使匈共领导层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

首先，鉴于匈牙利需要尽早采取一系列不受欢迎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同时还需要尽量维持住社会的稳定以及民众的认同，匈共当局除了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改革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在改革派领导人看来，匈共只能通过与社会上的反对派组织进行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型，因此在改革派的主导下，匈牙利议会于1989年1月11日至12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公众集会与结社法》，明确规定匈牙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及组建政党的权利，尽管它同时也规定，还需由一部单独的《政党法》来具体阐释政党活动的管理规范^②。此举事实上为民间建立合法的反对派政党打开了绿灯。

1月28日，时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匈共高层领导人波日高伊·伊姆雷在接受一档名为“168小时”的电台节目采访时，公开表示：党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义”，而非卡达尔时代所宣称的“反革命事件”^③。这一言论立即在民间和党内引发了十分剧烈的反应。民间要求匈共当局为1956年事件正名以及开启实质性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而匈共高层也因为迫于党内和民间的巨大压力，最终决定对波日高伊的这次“出格行为”免于追究责任^④。事实上，这起事件可以说开启了一连串剧烈的观念转变，而其中最受关注的，自然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此外，匈共党内改革派的声势也由此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提升，这也为此后匈共政策的持续变化奠定了某种基础。

^① Note 9, Document No. 32,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nyitó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13.,” in András Bogóci, Márta Elbert, Melinda Kalmár, Béla Révész, Erzsébet Ripp and Zoltán Ripp (eds.):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Budapest: Magvet, 1999, p. 26.

^② Note 6, Document No. 8/a,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március 30.,”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 85.

^③ 在1988年年中的时候，匈共中央曾任命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来负责对1956年事件重新进行调查，并最终得出了这个新的结论。然而这只是匈共党内的分析和情报，当局从未打算将这些结论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一般而言，相关专家的分析报告通常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党进行了相关处理之后，才会发布到特定的媒体上面。但是波日高伊此次却突然打破了这一不成文的规定，继而将匈共党内高层的分歧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Note 3, Document No. 4, “Független politikai szervezetek nyilatkozata az MAZMP KB állásfoglalásáról – 1989. februá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51 – 52.

^④ 波日高伊自行宣布这一党内调查结果的举动，还最终促使匈共中央在其于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大会上作出决议，接受了历史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并且允许社会上就这一历史议题展开讨论。Note 3, Document No. 4, “Független politikai szervezetek nyilatkozata az MAZMP KB állásfoglalásáról – 1989. februá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51 – 52.

匈共党内这起“意外事件”的风波尚未平息，另一事件又接踵而至。在1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匈共党内的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时任国务部长及匈共政治局委员的涅尔什·赖热突然宣布，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将不再反对在匈牙利实行多党制^①。

涅尔什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与会人士，匈共随即还就此草拟了一个政治宣言，并于2月13日正式对外发布。宣言声称，匈共中央已作出决议，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最终达成向多党制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平稳过渡^②。匈共中央还同时任命了一个专家团队，负责与各反对派组织的代表就政治合作的事宜展开会谈。至此，匈共从1988年5月开始的观望政策最终进入了尾声。

2月18日，匈牙利国内的11个反对派组织共同发表声明，对匈共中央发布的这份宣言表示欢迎，并要求匈共进一步为“1956年事件”及其参与者正名。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于2月6日正式开启了与反对党团结工会的圆桌谈判，匈牙利反对派组织继而提议，匈共当局应当尽快开启与反对派的圆桌谈判，确定未来议会选举的条件与规则^③。

然而，匈共当局并未理会反对派的上述提议。说到底，匈牙利的政治转型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其主导权此时依然牢牢掌握在匈共当局手里。而匈共接下来会如何行动，又是与其高层对于未来政治转型的预期和策略息息相关的。

（二）匈共的预期与策略

可以说，匈共领导层当时是一边参考着波兰的转型模式，一边再根据当时的情势来动态地调整自身的政治策略的。但是无论其策略在细节上与波兰当局有多少出入，其中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匈共当局也打算通过与反对派达成妥协的方式来实现这场转型。因此在匈共的计划当中，未来的议会选举也应当在与反对派组织进行协商和妥协之后才能举行，而开启某种形式的谈判或对话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① Document No. 6, “Meeting of the MSZMP Political Committee, January 31, 1989,” in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editors - in - chief), Melinda Kalmár, Zoltán Ripp, Miklós Vörös (ed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9 - 1990,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Chronology of Events*,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udapest: Cold War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1956 Institute, 1999.

② Anna Kosztricz, János Lakos, Karola Némethné, László Soós and György Varga (eds.), *A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Központi Bizottságának 1989. évi jegyzőkönyvei*, Vol. 1, Budapest: Magyar Országos Levéltár, 1993, pp. 195 - 198.

③ Document No. 4, “Független politikai szervezetek nyilatkozata az MAZMP KB állásfoglalásáról - 1989. februá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50 - 51.

在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匈共中央会议上，匈共领导层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决定开启与反对派组织的双边或多边会谈，但同时也对未来的对话平台设定了政治条件：首先，参加者必须接受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其次，必须接受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三，必须承认匈牙利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应尽义务，并同时致力于推动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瓦解^①。

从上述条件不难看出，此时匈共的“多党制”，是与反对派的期望颇为悬殊的。事实上，匈共的打算是在妥协的基础上与反对派组织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准政治联盟。匈共领导层希望，这样一个依然由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将使那些新近出现的“历史党派”^②回想起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分权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当年（1945~1947年）的“联合政府”政策。如果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能够有助于执政当局合法性的恢复，并进而通过紧缩政策的实施成功克服眼前的这场危机，那么匈共或许就能够在更长的时期内延后政治改革的推进^③。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和预期，匈共领导层制定出了对反对派阵营进行分化瓦解的关键策略——匈共方面打算通过与各个反对派组织单独举行谈判的方式来主导这场转型^④，即便是需要开展某种形式的“圆桌会议”，匈共在其中也必须占据明确的主导地位，而且其参加者也只能由匈共方面来决定。

直到1989年3月中旬，匈共的这一策略看起来都还是可行的^⑤。然而，此后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却打破了匈共的预期：首先，反对派组织出乎意料地联合了起来，并进而制定出了全新的谈判策略；其次，匈共领导层当中也出现了种种意见不合，这导致了匈共自身的分裂。

（三）反对派的联合与匈共的分裂

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匈牙利民间陆续成立起一批反对派组织。

^① Anna Kosztricz, János Lakos, Karola Némethné, László Soós and György Varga (eds.), *A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Központi Bizottságának 1989. évi jegyzőkönyvei*, Vol. 1, pp. 1–194.

^② 所谓“历史党派”是指那些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被匈共当局强行取缔、如今又得以恢复重建的政党组织。

^③ Melinda Kalmár, “From ‘Model Change’ to Regime Change: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MSZMP’s Tactics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András Bozó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7.

^④ 匈共与各个反对派组织举行单独会谈的主要用意便在于寻求未来的潜在合作伙伴，当然其前提是对方必须接受匈共的领导地位，并且认同匈共对于这一对话平台的基本定位。同时匈共还打算用某些现实利益来换取其他党派的忠诚，譬如在当局此后拟定的政党法草案中，就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匈共试图为其潜在的政治盟友提供某种财政激励的意向。

^⑤ 譬如当其他反对派组织在3月15日组织了独立于官方的示威活动的同时，匈共方面也成功地邀请到独立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官方组织的庆祝场合发表了讲话。

在前文提到的《公众集会与结社法》通过之后，其中一些人便纷纷宣布正式组党。这些反对派组织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近成立的政党组织，主要包括“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自由民主党人联盟”（SZDSZ）以及“青年民主党人联盟”（Fidesz）^①等；第二类则是前文提及的所谓“历史党派”，即那些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被匈共当局强行取缔、如今又得以重建的政党组织，主要包括“独立小农党”（FKGP）、“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SZDP）、“匈牙利人民党”（MNP）以及“基督教民主人民党”^②（KDNP）等；第三类则是一些非政党的民间公民团体，主要包括“独立工会民主联盟”（FSZDL）以及“鲍伊奇—日林斯基（Bajcsy - Zsilinszky）之友联谊会”^③（BZSBT）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匈牙利当时所涌现出的各种反对派组织，还远远不止以上提及的这些。相比于波兰的那个组织完备且实力不俗的全国性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匈牙利的反对派组织大多处于萌芽状态，其组织众多且极其分散，任何一个组织的规模和实力也都有限。以反对派此时的状况，根本难以与匈共当局实现任何有效且持续的互动与博弈，更遑论迫使匈共当局开启政治谈判了。

然而反对派阵营不久就迎来了一个历史契机。3月15日是匈牙利1848年革命纪念日，也被赋予了争取公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政治内涵。以往每次在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之外，民间都会自发地组织一些规模或大或小的游行示威活动，而警察也都要忙着镇压和取缔。然而到了1989年3月15日，匈共当局已经无法阻止反对派阵营共同发起的这场联合示威活动了。当天共有10万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纪念活动，其规模是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前参加官方纪念活动的2万人的整整5倍^④。这一情形不仅充分显示了反对派阵营所广泛享有的民意支持，同时也让反对派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就一定会显示出更为巨大的力量。

当晚一个民间非政党组织——“独立律师论坛”（FJF）的领导人科尼亚·伊姆雷（Kónya Imre）便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呼吁各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首先通过举行会谈的方式来就那些涉及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⑤。3月

① 以下分别简称为“民主论坛”、“自民盟”、以及“青民盟”。

② 以下分别简称为“小农党”、“社民党”、“人民党”、以及“基民党”。

③ 以下分别简称为“独立工盟”以及“鲍伊奇之友会”。

④ Magyar Nemzet, March 21, 1989, p. 9.

⑤ 该倡议书于3月17日得到了独立律师论坛的官方批准，继而在3月19日召开的自民盟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首次宣读，最后公开发表于3月21日出版的《匈牙利国家报》。其全文可参见 Document No. 5, “A Független Jogász Fórum felhívása az ellenzéki szervezetekhez - 1989. március 15.,”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rás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54 - 56.

19日，自民盟在其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倡议^①，此后其他反对派组织也纷纷响应。

1989年3月22日，八个反对派组织^②的代表们应独立律师论坛之邀在罗兰大学国家行政与法律系的一个会议室内举行了首次会谈，共同决定设立一个用以互通信息及协调立场的政治平台——“反对派圆桌会议”（EKA）。会议还最终决定，反对派圆桌会议有权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但是其前提是必须取得所有成员组织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员组织都拥有一票否决权^③。

4月7日，反对派阵营作出了拒绝参加匈共组织的某个政治会谈的决定，其理由是它们中的一个成员组织——青民盟并未出现在受邀之列^④。从此，反对派圆桌会议的任何一个成员组织都未再公开接受匈共进行单方面政治会谈的邀请。匈共对反对派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遭遇了瓶颈。

事实上，匈共领导层不仅低估了反对派阵营的凝聚力，同时也低估了党内改革派的发展势头。当反对派圆桌会议就未来与匈共当局进行谈判的权限、形式及主题表明立场后不久，匈共党内的改革派群体也于4月15日在中部城市凯奇凯梅特（Kecskemét）召开了他们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会上对当时匈共党内的意见分歧进行了公开的讨论，而且多数意见都倾向于要求匈共领导层接受反对派阵营提出的开启筹备会议谈判的提议^⑤。面对这样的局面，匈共当局不得不接受了开启筹备会议谈判的提议。

三 筹备会议谈判

（一）核心议题

1989年4月22日，由匈共领导人费伊蒂·哲尔吉领衔的匈共代表团和由两

^① Note 1, Document No. 5, “A Független Jogász Fórum felhívása az ellenzéki szervezetekhez – 1989. március 15.,”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 56.

^② 这八个反对派组织分别为：民主论坛、自民盟、青民盟、小农党、社民党、人民党、独立工盟和鲍伊奇之友会。

^③ Document No. 7,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alakuló ülése – 1989. március 22.,”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63 – 72.

^④ Document No. 11/a,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április 7.,”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94 – 109.

^⑤ Attila Ágh, József Géczy, József Sipos (eds.), *Rendszerváltók a Baloldalon: Reformerek és Reformkörök*, 1988 – 1989, Budapest: Kossuth, 1999, pp. 125 – 132.

位宪法学专家——绍约姆·拉斯洛 (Sólyom László) 和特尔杰希·彼得 (Tölgyessy Péter) 领衔的反对派代表团, 开始就未来朝野双方开展圆桌谈判的各项重要事宜展开了筹备会议谈判^①。

筹备会议谈判涉及诸多议题, 首先引发争议的便是未来的谈判究竟应该由几方组成。反对派方面坚持要求进行双边会谈——匈共当局为一方, 反对派圆桌会议为另一方。然而匈共方面却不愿采取这种形式, 因为如果将整个反对派的联合组织作为谈判对手, 那样显然会增加匈共的谈判难度, 因此, 匈共方面要求采取与各个反对派组织进行多边会谈的形式, 此后还提议要将其数个卫星组织也纳入到未来的谈判中来^②。

随着筹备会议谈判的进行, 朝野双方在各项议题上的分歧也进一步显现出来。首先, 匈共方面一直要求, 除了政党法和选举法等政治议题外, 经济和社会议题也应被列入未来的谈判议程。其理由是当前的这场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可能催生出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 从而对政治转型进程构成威胁。因此朝野双方有责任就危机的解决之道共同予以探讨^③。然而反对派方面却坚持只愿就那些与政治转型相关的议题进行谈判, 不愿涉及任何经济社会议题。其理由有两点: 一是从法理上来说, 此次参与谈判的反对派代表只是其自身组织的合法领导人而已, 他们并未获得民众的正式授权来与当前的政府分担任何的经济改革责任, 而只有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即经由未来的议会自由选举上台的新一届政府, 才应承担相应的权责; 二是就现实的可操作性而言, 鉴于多数反对派领导人此前都未参与过经济部门的运营与管理, 同时也缺乏进行决策所需的基本数据信息, 因此事实上也不具备参与经济改革的专业能力和信息资源^④。

其次, 在所有涉及政治转型的基本法律当中, 匈共方面仅仅着重于强调政党的修订这一议题, 并希望以此来换取反对派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但是反对派方面的诉求却要全面得多, 譬如他们还提出要就《公众集会与结社法》修正问题、

^① Document No. 14,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és az MSZMP KB szakértőinek előkészítő tárgyalása – 1989. április 22.,”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149 – 152.

^② Document No. 14,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és az MSZMP KB szakértőinek előkészítő tárgyalása – 1989. április 22.,”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149 – 152.

^③ 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51 – 153.

^④ 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54 – 155.

各政党对于媒体资源的公平使用，以及保障转型不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侵扰等诸多议题与匈共当局进行谈判。

最后，匈共方面坚持要在宪法修正案中加上设立总统职位和宪法法院的相关条款，但在反对派方面看来，这两个重大的立法议题并不能纳入到此次谈判的权限范围之内，而是同样应当留给经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新一届议会予以决定^①。

（二）陷入僵局

在4月底至5月初的这段时间，筹备会议谈判陷入了某种僵局。然而局势对匈共方面来说似乎更为不利，因为反对派此间不断地通过媒体来宣扬其主张，并且对本届议会立法职能的合法性也提出了公开的质疑。

在5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匈共代表团负责人费伊蒂承认，即便有可能与那些历史党派结成联盟，恐怕也只能等到选举过后了，因为如今“每个党派都想要在选举当中一试身手，并认为那样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②。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共需要对其年初制定的策略进行及时的调整。在对未来的议会选举进行了利弊权衡，并对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联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之后，此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将彻底改变这场转型命运的重大决定——与波兰当局不同，匈共高层决定接受举行竞争性选举的方案。匈共政治局委员涅尔什是这样看的：“如今我们能够期待什么呢？我们已经无法再推动建立一个初步的政党联盟了，因为很不幸……形势已经变了。如果我们当初能早点推动这项工作的话，也许还可能成功，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如今只能接受举行竞争性选举这个选项了。”^③

由此可见，虽然筹备会议谈判在台面上陷入了僵局，但是匈共高层在同时段内却迫于形势的压力，已经作出了实质性的策略转变，这也意味着，离打破僵局的时机已不是很远了。

（三）打破僵局

5月20日，匈共党内的改革派群体在匈牙利的东南部城市塞格德（Szeged）召开了全国大会。大会决议敦促匈共领导层放弃当前的拖延战术，尽快开启与反

^① 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rás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47 – 149.

^② Document No. 21, “Meeting of the MSZMP Political Committee, Verbatim Record of Minutes, May 2, 1989,”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9 – 1990, 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Chronology of Events*.

^③ Ibid.

对派的实质性谈判，同时还要求让改革派领导人成为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改革派人士还继而提议，如果匈共领导层不愿接受这一建议的话，他们将有可能考虑转而以政府或议会的名义来与反对派直接开启谈判^①。

到了5月底，匈共方面已经愈加感受到了谈判僵局所带来的政治危害——随着反对派方面不断地发表质疑议会立法职能的声明，本届议会的合法性已经很难维持到下一次常规的议会大选。因此在匈共看来，大选的时间必须提前，但这显然需要得到反对派的认可才行。

同时令匈共惴惴不安的还有一件即将临近的大事——因“1956年事件”而被处决的纳吉及其同僚的重新安葬仪式被确定在6月16日举行，即纳吉被处决31周年的忌日。葬礼原先只是安排在偏远的市郊公墓举行，但是在筹备方历史正义委员会（TIB）以及纳吉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改为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上举行^②。谁都能预料到，届时一定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那样的场面将会进一步对匈共构成不利。

在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费伊蒂向与会者坦承，时间已十分紧迫，必须赶快做出行动。为了打破僵局，匈共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对所有那些阻碍谈判开启的议题逐个进行了讨论，并得出结论认为，筹备会议谈判可以告一段落了，真正的谈判应当于6月的上半月开启。这次将不再是简单的非正式会议，而是最终能够达成某种全民共识的正式会谈。基于以上考虑，匈共决定在大多数议题上都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③。

对于反对派方面来说，虽说此时的形势确实更为有利一些，但他们并不愿谈判僵局无限期延续，因为对方显然拥有一些令人顾忌的反制手段，譬如匈共当局可以以政治谈判未能及时启动为借口，单方面迫使议会通过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那些重要法案^④。因此，尽快开启实质性谈判已成为朝野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选择。

^① Attila Ágh, József Gécsi and József Sipos (eds.), *Rendszerváltók a Baloldalon: Reformerek és Reformkörök*, 1988–1989, pp. 201–211.

^② Melinda Kalmár, “From ‘Model Change’ to Regime Change: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MSZMP’s Tactics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p. 56.

^③ Minutes of the May 26, 1989 MSZMP Politburo meeting, Hungarian National Archives (HNA) M – KS – 288. f. 5/1066. e.

^④ 事实上，匈共当局已经推动议会在5月30日至6月2日的会期中对一些经济法案进行审议，同时还对一些涉及国有企业以及土地产权的转型法案进行了修订。此举引发了反对派阵营的激烈抗议，他们指责这种不负责任的修法行为将会开启某种“自发私有化”的进程，使得企业管理层侵吞国有资产成为可能。

6月7日,反对派圆桌会议收到了匈共给出的关于开启圆桌谈判的书面提议,其专家团随后于6月9日与匈共代表团签署了关于开启正式谈判的协议。事实表明,到了筹备会议谈判的最后阶段,朝野双方均就此前的立场作出了某种妥协:反对派圆桌会议最终接受了将匈共的卫星组织列为圆桌谈判的“第三方”的方案,不过他们也争取到了如下条件,即谈判各方均只拥有一票表决权,若是反对派圆桌会议与匈共方面达成任何协议,所谓的“第三方”也无权否决。此外,反对派也未能阻止匈共将经济议题纳入谈判议程^①。

6月10日,匈共、反对派圆桌会议以及第三方组织的代表们集齐于匈共中央的总部大楼内,共同签署了开启三方会谈的协议。协议明确宣示,政府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民意,而民意只能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来予以表达,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同时,民主转型应当杜绝一切暴力因素,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实现,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应诉诸武装力量。协议还规定,只有在政治谈判达成相关协议之后,国家才能进行相应的宪政变革。这样便杜绝了匈共单方面推动其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的可能性^②。至此,筹备会议谈判的大幕已徐徐落下,圆桌谈判即将开始。

四 圆桌谈判

(一) 谈判的架构与议题

1989年6月13日,来自三方谈判主体的代表们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内的猎手大厅举行了首次全体大会,对外宣告“匈牙利国民圆桌谈判”正式开幕。会上三方均派出一名代表作了开幕发言,阐述各自的基本政治立场^③。

6月21日,圆桌谈判的三方代表就此次谈判的组织架构和具体议题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谈判架构设为三个层级:最低一级是“工作委员会层级”,负

^① 反对派方面之所以最终同意将先前不愿考虑的一些议题纳入谈判议程,其实不仅是出于作出妥协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现实操作的需要。因为筹备会议谈判达成了一条协议,规定只有在谈判达成相关协议之后才能让相关法案进入议会的立法程序。因此,为了避免匈共单方面推动其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反对派方面也不得不将相关议题纳入谈判议程。Document No. 28,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június 7.,”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ғyал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552 – 560.

^② Document No. 31, “Megállapodás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megkezdéséről – 1989. június 10.,”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ғyалások 1989 – Ben*, Vol. 1, pp. 604 – 608.

^③ 相关会议录音稿可参见 Document No. 32,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nyitó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13.,”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ғyал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3 – 24.

责具体议题的谈判工作；在此之上是“中级会谈层级”，负责就那些工作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的议题进行更高层级的磋商与谈判；最高一级是“全体大会层级”，主要定位为各方发布重要宣言及正式签署谈判协议的公共政治平台^①。

协议规定，各方应于当日傍晚举行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上设立负责中级会谈的两个（政治与经济）谈判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两个中级会谈委员会负责设立其下一级的各六个工作委员会。协议还详细列举了政治和经济谈判所需讨论的各项议题，而此后的十二个工作委员会也正是根据这些分类议题来设立的。

具体而言，六个政治谈判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如下：

第一工作委员会：负责政治原则与政治机构的谈判，主要涉及新宪法及宪法修正案的拟定、总统职位和宪法法院的增设等议题；

第二工作委员会：负责政党法的谈判，主要涉及为政党运作设立各种法律规范等议题；

第三工作委员会：负责选举法的谈判，主要涉及选举方式的选择及相应议会比例的划分、候选人参选议会议席的提名门槛设置，以及议会议席的获选规则设置等议题；

第四工作委员会：负责刑法及刑事程序法的谈判，主要涉及刑事逮捕和审判程序的规范、“政治罪”的取消等议题；

第五工作委员会：负责新闻媒体法的谈判，主要涉及公共媒体的开放与管理、媒体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谈判内容的披露方式等议题；

第六工作委员会：负责为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设立相关法律保障的谈判，主要涉及国家武装部门（如警察和军队）的管理运作规范的重新设置，以及对匈共自身拥有的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的处置方式等议题。

六个经济谈判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如下：

第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经济危机应对策略的谈判，主要涉及国家债务管理、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抑制通货膨胀等议题；

第二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应社会危机应对策略的谈判；

第三工作委员会：负责产权改革的谈判，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等议题；

^① Document No. 38/a, “A Nemzeti Kerekasztal résztvevőinek megállapodása a tárgyalások témaköreiről és munkarendjéről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rás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38 – 139.

第四工作委员会：负责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社改革的谈判；

第五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央政府财政改革的谈判，主要涉及公共财政法的修订等议题；

第六工作委员会：负责竞争与反垄断法的谈判^①。

协议签署之后，三方代表在猎手大厅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三方均派出代表分别就民主政治转型和应对经济社会危机这两大主题进行了两轮主旨发言，阐述各自在各项具体议题上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及相应理由^②。

（二）核心争议

圆桌谈判开幕之后，各个工作委员会开始就各项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和磋商，并且逐步地达成了一些协议。同时，谈判双方在数个关键议题上的实质性分歧也显露出来，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关于总统职位的相关议题。

就匈共方面而言，其领导层受到波兰转型模式的启发而要求设立一个掌握较大权力的总统职位，并主张在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之前通过公民直选方式选举出总统。其公开理由是，从此次谈判达成协议到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之间有半年左右的空档期，政府的合法性令人担忧，而经济社会危机的应对依然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设置一些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而如果能有一个具有一定合法性且较为集权的总统来维持局面，将很可能有助于防止政府陷入进一步的瘫痪、社会陷入更深的危机^③。

匈共的上述理由无可厚非，但它还存在着另一层考虑。因为当时反对派阵营根本无力推出一个能够与匈共候选人相抗衡的总统候选人，而当匈共方面于6月下旬明确将人气颇高的改革派领导人波日高伊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格局^④。因此在匈共方面看来，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迫使反对派接受在议会选举之前设立一个民选总统职位的话，那么该职位必然会落到匈共候选人的手

^① Document No. 38/a, "A Nemzeti Kerekasztal résztvevőinek megállapodása a tárgyalások témaköreiről és munkarendjéről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38 - 139.

^② 相关会议纪要可参见 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43 - 163.

^③ Document No. 39,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június 2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145 - 147.

^④ 匈共中央在其于6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会议上，作出决议将波日高伊提名为其总统候选人。Anna Kosztricz, János Lakos, Karola Némethné, László Soós and György Varga (eds.), *A 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Központi Bizottságának 1989. évi jegyzőkönyvei*, Vol. 2, pp. 1119 - 1239.

中。匈共不仅可以掌握民选总统职位所享有的权力和威望，还可以进而影响各种政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在未来的政治转型进程中占得先机，全方位地确保匈共自身的利益。因此，就此次谈判中所有那些值得争取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来说，匈共领导层一直将设立民选总统职位视为重中之重。

就反对派阵营而言，其内部同样面临着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对匈共作出妥协的艰难抉择。在总统职位这一议题上，反对派组织间的分歧也开始逐渐地浮出水面。概括来说，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分为“妥协派”和“原则派”两个阵营。“妥协派”阵营包括民主论坛、基民党小农党、人民党以及鲍伊奇之友会这五个组织，他们倾向于接受匈共关于总统职位的相关主张。在这些组织看来，如果因为反对派在这一议题上过于坚持原则而致使此次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反对派与匈共业已达成的其他协议可能会付之东流。因此，通过作出实质性妥协来推进这场和平转型的做法是值得的，而且妥协协议的达成恰恰也可以为未来的民主制度建设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此外，这些组织对于波日高伊这个人也具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因此如果波日高伊通过直选当上了总统，他们也看不出那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危害^①。

“原则派”阵营包括自民盟、青民盟、社民党以及独立工盟这四个组织，他们坚决反对接受匈共的相关提议。一方面，这些组织坚定地维护民主政治的原则，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那些在他们看来将可能会使改革误入歧途的宪政安排。另一方面，这一立场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了他们对其他反对派组织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他们推测，波日高伊与民主论坛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帮助双方结成某种政治联盟。在这个联盟当中，一方是旧体制的改革派势力，得到享有很强合法性的民选总统的支持；另一方则是反对派中最有实力的政党组织及其盟友。显而易见，这个大联盟很可能会使得其他诸如自民盟和青民盟等自由派政党趋于边缘化，并进而对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改革构成某种阻碍^②。因此，这些组织主张，即便设立总统职位，也应当在议会大选之后由新一届民选议员投票选出总统，在此之前，可由议长代行总统职务^③。

^① Document No. 45,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június 6.,”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290 - 296.

^② János Kis, “1989: A Vig esztend 8 13) *Háttér* 8 13) 10, 1999, pp. 38 - 39.

^③ Document No. 45,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június 6.,”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 301.

除了总统职位议题，谈判双方还在三个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首先，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撤销其在各个工作单位中所设立的匈共党组织，而匈共则表示，这是其固有的权利，反对派组织也有权这么做；其次，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对其党产进行清算和公示，并且在转型期间为其他新建政党和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而匈共方面则表示，只有义务对其自身党员提供党产统计信息，同时也不打算对其他政党和组织提供任何财政支持^①；最后，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立即解散其所拥有的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而匈共方面则表示，只打算对工人纠察队的规模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②。

（三）最终方案

截至9月中旬，谈判各方已经逐步就宪法修正案中的某些规定、选举法草案，以及刑法和刑事程序法的修订等重要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然而上述的几个核心争议却依然横亘在各方之间，使得这场谈判迟迟无法达成最终协议。

在整个谈判期间，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曾就总统职位这一议题展开过数次异常激烈的辩论，但是分歧似乎无法弥合。在9月11日的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大会上，民主论坛的代表曾提议，反对派方面可以坚持其在议会大选之后再由议会选举出总统的立场，但是出于打破谈判僵局的考虑，是否可以破例接受在议会大选之前通过直选选出这一届的总统。该提议得到了多数票赞成（5票赞成、4票反对），但是自民盟、青民盟和社民党动用否决权阻止了该提议的通过^③。到了9月15日的内部大会上，民主论坛的代表再次提议接受直选的方案，但主张为获选总统的条件设置一些较为严苛的规定。该提议再次得到了多数票赞成（5票赞成、4票反对），但也再次因为自民盟和青民盟的反对而未能获得通过^④。

“妥协派”和“原则派”之间所体现出的实质性分歧似乎已开始直接威胁到反对派阵营的内部团结，乃至反对派圆桌会议自身的组织存续。最终，自民盟代表特尔杰希的发言为这场看似永无休止的辩论画上了句号——他宣布，如果最

^① Document No. 53,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középszintű politikai egyeztető bizottságának ülése – 1989. június 27.,”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2, pp. 620 – 625.

^② Note 31,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 511.

^③ Document No. 72,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1.,”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266 – 295.

^④ Document No. 74,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5.,”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гат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336 – 390.

终的谈判协议当中包含了某些他们无法同意的条款，那么自民盟将拒绝签署这一协议，但是与此同时，自民盟也不会动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去阻止其他反对派组织签署协议。此外，自民盟还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就自身的这一决定发表一个单独的声明。随后，青民盟和社民党的代表们也表示将效法自民盟的这一做法^①。

9月18日晚19时，三方代表在时隔近三个月之后再次聚首于议会大厦的猎手大厅，举行了谈判开启以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也是此次圆桌谈判的闭幕大会。三方代表都对自身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最后的辩护^②。

自民盟代表特尔杰希利用发表单独声明的机会对其立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特尔杰希表示，举行此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尽力移除通往自由选举以及和平民主转型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可是从目前所拟定的协议文本来看，只能说是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由于匈共领导层一直拒绝作出实质性的妥协，谈判各方才未能在另外一些关键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会使整个国家偏离民主转型的正轨，自民盟并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因此，自民盟最终决定拒绝签署这一协议。但是，鉴于自民盟的立场在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自民盟同时也决定放弃行使其一票否决权，从而让那些愿意签署协议的反对派组织可以得偿所愿^③。

如果说以上发言尚未超出与会代表的意料的话，那么特尔杰希接下来所作的一个提议，则彻底扭转了整个政治局势。特尔杰希表示，既然此次谈判尚有数个议题未能最终达成协议，那么自民盟提议举行一场全民公投，对这些涉及政治转型的根本议题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④。

这个提议让在场的匈共代表团有些猝不及防，其代表波日高伊随即作出了激烈的回应。波日高伊表示，某些反对派组织所作的声明在匈共方面看来，仅仅是出于其自身目的来利用公共舆论所作的政治宣传而已。而自民盟代表选择在闭幕

① Document No. 74,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5.,"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380 - 390.

② 相关会议纪要可参见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492 - 507.

③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500 - 501.

④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 501.

大会上而非在此前的谈判桌上抛出全民公投的提议，也显然是意在对民众进行某种误导，试图用舆论宣传的各种招术来绑架人们的政治判断罢了。此外，这一唐突的举动还会给人们留下某种谈判陷入混乱局面的不良印象^①。

在上述这场激烈的政治辩论结束之后，三方代表随即举行了协议的签署仪式^②。该仪式是通过电视进行直播的，因此无论是当时的匈牙利民众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得以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然，人们也目睹了三个反对派组织——自民盟、青民盟以及独立工盟最终并未签署协议，而社民党则是在协议上标明了其不同意在议会选举之前举行总统直选的立场之后才签署了协议。

五 后续进展

（一）全民公投

圆桌谈判协议签署之后不久，自民盟开始发起全民公投的联署签名活动。公投设有如下四个议题：（1）是否应当禁止在工作单位设立政党组织？（2）匈共是否应当全面公示其资产统计信息？（3）是否应当解散工人纠察队？（4）是否应当在议会大选之后再举行总统选举？自民盟还形象地将其命名为“四个赞成（Four Yes）公投”，因为他们期望民众在这四个议题上都投出赞成的一票^③。这项联署签名活动还得到了青民盟和社民党的支持，其后小农党也加入了支持的行列。这些反对派政党此后顺利搜集到了发动公投所需的联署签名，议会也继而作出决议，将此次公投的日期确定为11月26日。

与此同时，匈共方面的情势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1989年10月6日至9日，匈共召开了第14届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作出决议解散匈共，同时宣布其作为专制政党的历史已至此终结，此后将改组为一个全新的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党”（MSZP）^④。社会党随后决定将在全民公投的前三个议题上接受反对派

^①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505 – 506.

^② 协议全文可参见 Document No. 79, “Megállapodás a politikai egyeztető tárgyalások 1989. június 13 – a és szeptember 18 – a közötti szakaszának lezárásáról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516 – 519.

^③ Note 28, Document No. 78, “A Nemzeti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plenáris ülése – 1989. szeptember 18.,” in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lókönyve: Kerekasztal – Tárgyalások 1989 – Ben*, Vol. 4, pp. 510 – 511.

^④ 以下简称为“社会党”。

的主张，只是在总统选举这一议题上依然坚持原先的立场^①。也就是说，公投需要决定的议题事实上只剩下最后那一个了。

推动实现全民公投的过程，同时也成了各政党角逐未来议会席位的选战的一次预演。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全民公投可谓不失时机地为反对派发动另一波的民主攻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政治平台。事实上，也只有通过采取这样的主动攻势，他们才能确保自己关于总统选举的主张能够在全民公投中获胜，并进而为之后的选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11月26日，全民公投如期举行。当天共有58%的选民参与了公投。在前三个议题上，赞成票都一边倒地超过了95%。然而在是否支持在议会大选之后举行总统选举这最后一个议题上，投票结果却相当地接近，赞成的一方仅以6101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险胜^②。

（二）议会大选

1989年10月23日，即1956年事件33周年的纪念日，时任议会议长，同时兼任代理总统的絮勒什·马加什（Szörös Mátyás）在议会大厦前的科苏特广场上向民众宣布，匈牙利放弃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此后将致力于转型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此时的整个选战情势对于匈共及其后继党来说确实不容乐观。首先，匈共在签署协议的时候还在那三个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又迅速转变了立场，这本身就造成了极为不佳的观感。其次，事态进展很快表明，将总统选举与其他三个议题一起交由全民公投作出决定，对于匈共来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民众在那三个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但对于总统选举方式的立场却并非铁板一块。虽然反对派在这一议题上获得了险胜，可是这依然意味着匈共原本寄予最大期望的最后一个制度性倚靠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

与此同时，各政党在此次选战当中与社会党的亲疏程度，几乎就被民众等同于对于民主转型的忠实程度。因此当面对着原本就持有较为激进的反共立场的那些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其中正在日益崛起的竞选对手——自民盟的时候，原先与

^① Zoltán Ripp, "Unity and Division; the Opposition Roundtabl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p. 34.

^② Erzsébet Ripp, "Chronology of the Hungarian Roundtable Talks, January 1989 - April 1990," in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p. 380.

匈共改革派关系颇深的民主论坛如今也不得不开始疏远其与社会党的距离了^①。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党在此次选战中的边缘化态势。

1990年3月25日，议会大选如期举行。民主论坛在此次大选中赢得了165席，接着依次是自民盟94席，小农党44席，社会党33席，青民盟22席，基民党21席。5月2日，新一届议会举行了正式就职大会。5月23日，议会通过了政府内阁任命，由民主论坛、小农党以及基民党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正式就职，民主论坛的领导人安托尔·约瑟夫（Antall József）担任了自由选举后的首任政府总理。社会党则沦为议会中一个边缘的小反对党^②。至此，匈牙利得以初步确立起议会民主制，政治转型的主体任务也大致宣告完成。

结 论

本文对匈牙利实现政治剧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还对匈共当局和反对派阵营的关键政治策略予以了分析，并进而就朝野双方针对政治谈判所展开的博弈过程进行了重点的介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就此次转型进程中所涉及的所有谈判议题予以全面的介绍。事实上，在针对政党法、选举法以及新闻媒体法等法案的相关谈判中，也同样包含了诸多对于此次转型而言至关重要的谈判议题。同样不难想见的是，朝野双方就所有这些转型议题所达成的相关协议以及由此所确定的规则安排，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此后的转型方向与转型质量。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转型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显然能为政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多颇具含金量的重要案例。进而言之，对于不同东欧国家转型进程的对比研究，还能为其剧变后所经历的不同政治走向提供某种解释框架，而这也足以成为比较史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

最后再回到匈牙利的政治转型本身，这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了变数。然而最终却得以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成功实现了这场转型，并且自始至终将整个过程保持在和平理性的框架之下。这一和平转型的方式，与“1956年事件”中

^① Zoltán Ripp, “Unity and Division: the Opposition Roundtabl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pp. 34 – 35.

^② Erzsébet Ripp, “Chronology of the Hungarian Roundtable Talks, January 1989 – April 1990,” in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pp. 381 – 383.

的民众武装起义可谓形成了某种极为鲜明的对比。而匈牙利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当年暴力革命的历史覆辙，转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体制变革，其核心原因便在于如今的各方政治势力恰恰是在当年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来确定其转型战略的^①。也就是说，“1956年事件”的历史教训使得如今的朝野双方都意识到，如果试图诉诸暴力手段来推动政治转型的话，首先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惨重后果，对政治谈判的进程也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其次，很可能会促使政府权力进一步向那些愿意并且擅长使用暴力手段的保守派领导人手中集中；最后，暴力冲突局面的出现与升级，还很可能会招致苏联军队的干涉与镇压，从而将国家的命运再次置于苏联当局的掌控之下，而这是所有匈牙利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对历史的借鉴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匈牙利国内期望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社会共识，这又为匈共党内改革派和反对派中温和派的不断发展壮大，并进而形成某种良性的合作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匈共党内保守派和反对派中激进派在整场转型进程中的愈益衰弱与边缘化。总而言之，匈牙利此次的成功转型，是与诸如其朝野双方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感及建设性态度、普通民众对于民主转型的支持与配合，以及国际局势的适时因应等诸多国内外因素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之所以能够保持“低度暴力”状态的原因时也曾分析指出，一些国家在民主化开始之前，或在民主化进程初期曾有过重大社会暴力的体验，这种体验可能会反过来促使政府当局与反对派双方都公开地宣布放弃暴力手段的使用。就此而言，匈牙利的转型进程无疑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重要案例。〔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